



华夏文摘增刊
文革博物馆通讯（三九九）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CND）主办 • — • — •

—— 增刊 第五六五期 ——
（二〇〇七年四月二日出版）

本期目录 （zk0704a）

-
- | | |
|-------------------------------------|------------|
| 【史海钩沉】胡耀邦在科学院的“百日维新” | 唐 非 |
| 【文革一页】“文化大革命”之火是怎样在体育界燃烧起来的 | 余 樵 |
| 【往事回首】《红卫兵兴衰录——清华附中老红卫兵手记》
（节选二） | 宋柏林著 余汝信编注 |
-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museums.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资讯。

来稿请投寄 tougao@cnd.org。请在 subject 中标明 CR 字样。

【史海钩沉】

胡耀邦在科学院的“百日维新”

• 唐 非 •

◇ 再试身手

1973年3月，根据毛泽东的批示，邓小平恢复了党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职务，以后，又相继被增补为中央政治局委员、被任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兼解放军总参谋长。接着在十届二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

邓小平的整顿工作在同“四人帮”的斗争中艰苦地开始了。作为一个有远见的政治家，邓小平一直高度重视科学技术，认为科学技术上不去，四化建设就是一句空话。很久以来他就关注着集中国科学技术精英之大成的中国科学院，谋划着通过大力的整顿，恢复和健全中国科学院的工作。

科学院在“造反派”控制下，当时已经是百孔千疮。原有的一百零六个研究所只剩了四十多个，北京地区一百七十多位著名科学家，有一百三十多人被作为“反动学术权威”赶进“牛棚”，或者横遭种种迫害；有几十名科学家和领导干部甚至被迫害致死。

邓小平需要一个有足够的胆识和魄力的人去解决这些纷乱如麻的问题，去雷厉风行地整顿中国科学院的工作。

其时，胡耀邦正在由王洪文直接领导的读书班“学习”。这个读书班主要是为“四人帮”帮派体系的高级干部开办的，也安排了少数不属于这个体系的、有“严重错误”的领导干部作为“对立面”参加，胡耀邦便是其中之一。在这里，他仍处在被批判被监视的地位。但他不理睬那些意在影射邓小平的学习内容，在批判“经验主义”的学习会上一言不发。他仍然按照自己的需要，埋头阅读马列主义原著。

一次，叶剑英被请到这个读书班来讲话。他一眼瞧见坐在后面的胡耀邦，便似乎有意地高声说：耀邦，你也来了？胡耀邦说，我来了，叶参座（叶剑英曾任八路军参谋长，胡耀邦一直称他为“叶参座”。），您身体好吧？叶剑英于是招呼要他坐到前排来。散会以后，叶剑英询问他近况如何，他告诉说，还没有“解放”。叶剑英鼓励他说：别理他们，让你出来工作就自然解放了。叶剑英回去以后，就向邓小平讲了胡耀邦目前的境遇，并且举荐胡耀邦协助邓小平开展整顿工作。

邓小平同胡耀邦已多年没有见面了，但他相信胡耀邦对于“整顿”会同他持同样态度。

于是，邓小平经请示毛主席后，由中央决定让胡耀邦去中国科学院。

胡耀邦7月16日从读书班回到家里，7月17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分管科学技术工作的华国锋就找他和李昌谈话，通知他们中央的任命，并且传达邓小平的指示：整顿首先是党的整顿，关键是领导班子，搞好安定团结，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和各部门的业务，要坚决同派性作斗争。邓小平向他们提出三点具体要求：一是了解情况，向国务院汇报，二是搞一个科学院发展规划，三是准备向中央提出科学院党的核心小组名单。第二天，7月18日，他就来到中国科学院。

胡耀邦对于出来工作满心欢喜，已经十年没有工作了呀！虽然，他想到自己对科学技术是外行，也不了解科学院这个环境的深浅，但“协助小平同志进行整顿”这个工作任务，就使他勇气百倍。他很清醒地认识到，这次整顿，就是要在一些重要部门、一些重要问题上，把“文化大革命”中颠倒了的思想、理论、政策是非重新颠倒过来，把严重的混乱局面扭过来，把无辜被打倒的干部解脱出来，把党的好的传统作风恢复起来。面对这么重要这么有意义的工作，他愿一试身手。

事情是千头万绪，但胡耀邦指挥若定。他请李昌负责日常的全局工作，王光伟、刘华清负责业务工作，胡克实、王屏负责政治工作，他自己则集中精力搞调查研究，以准备向国务院汇报。

经过近一个月的调查和思考，8月15日，他召开了领导干部座谈会。根据当时院机关各部门以及下属的研究所许多是“造反派”在掌权的情况，他针对性明确地宣布，整顿工作主要是全院领导班子的组织整顿和思想作风的整顿。

为了整顿工作的顺利开展，他首先着力纠正各种荒谬观点。他在各种场合，就原本是理所当然而现在被“四人帮”及其帮派分子弄得异常混乱的问题，发表了一系列针锋相对的讲话并采取了相应措施。

“四人帮”及其帮派分子说过去科学院是“三脱离”：脱离无产阶级政治、脱离生产实际、脱离工农兵群众；提出要“三面向”：面向农村、面向工厂、面向中小学。胡耀邦斩钉截铁地说：科研人员搞科研就是结合实际，为什么一定要到工农生产中去？科学院就是科学院，不是生产院、教育院、白菜院、土豆院，科学院就是搞科学的，搞自然科学的。

“四人帮”及其帮派分子鼓噪“开门办所”。胡耀邦说：什么叫“开门办所”？七机部开门办？原子能所加速器开门办？还要保密呢，连参观都不让。什么“开门办所”？我不懂，我看这种独创性还是少搞点为好。

针对喧嚣一时的对所谓“业务挂帅”的批判，他在各研究所大声疾呼：“所有搞科研工作的共产党员，业务上非上去不行！……今后二十五年赶上世界先进水平，这是我们赌了咒、发了誓的。科研工作搞不上去，不仅是犯错误，而且是犯罪。……搞业务的台风要刮起来”，“刮十级台风不够，要刮十二级台风。……对科研事业着急的人，才有党性，才有爱国心。”

这些话，在当时可谓是“石破天惊”之谈，是有意的宣战。正像他在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讲话时借题发挥说的：“我们现在脱离了单纯的脊椎动物，有了脊椎就有了骨头，可以爬行，可以站起来。人没有骨头还行吗？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一个革命者，要搞点马克思主义，搞点骨头。”又说：谁好谁坏，一时弄不清，但埋在地下的化石都挖出来了，历史的面貌是怎么也埋没不了、混淆不了、歪曲不了、抹杀不了的。科研人员们好久没听到这样令人振奋的讲话了。一时之间，他的每一篇讲话都迅速在不同单位传播开来。胡耀邦支持搞科研的鲜明观点，他的敢于否定各种谬论的气概，甚至他所使用的那些极富个性的尖锐的语言，都使科研人员欢欣鼓舞，感到得以一舒长期郁积在胸的闷气，感到有了依靠，又可以从事科学研究为国效力了。造反派头头的气焰也不得不有所收敛。胡耀邦很快获得科技人员的信任。

经过同李昌等领导成员的反复研究和同有关方面的充分酝酿，胡耀邦等向中央、国务院提出了中国科学院党的核心小组组成人员的建议。10月，党中央根据这个建议，正式任命郭沫若院长继续担任核心小组组长，胡耀邦担任第一副组长。李昌、王光伟担任副组长，刘华清、王屏、胡克实等任核心组成员，稍后又增加武衡、王建中、秦力生、郁文。以前造反派组织头头列席核心小组会议，这个做法以后废除。

◇ 起草《汇报提纲》

对基本情况已经掌握，胡耀邦同其他领导成员按邓小平的要求，积极准备向中央提交一份提纲挈领的汇报。8月11日拿出了第一稿，定名为《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汇报提纲的讨论稿）》。

《提纲》共分六个部分，第三部分是《提纲》的核心内容。在这一部分里，胡耀邦要着力阐明的是什么是政治以及政治工作的作用问题。在起草提纲时，胡耀邦用十分简明的语言表达了政治和科研的关系，政治是要挂帅的，但政治工作是为科研服务的。胡耀邦还指出，政工干部不能做空头政治家。他说，科学院的政工干部的责任在什么地方？在本世纪内帮助党培养出上千个一流的专家、上万个二流的专家，我们的历史贡献就不小了。

《提纲》中明确指出，“如果我们的政治工作使科技人员不敢钻研业务，不敢学外文，不敢看业务书，那就是失败的政治工作。如果我们的政治工作是反对钻研业务，那就是空头政治，就是在政治上犯了方向错误。”这些话是太尖锐了，文件起草人有顾虑，主张不要写，胡耀邦语含诙谐地说：“我就这么一点创造性，你们就把它留着吧。”

◇ 苦心经营

《提纲》第一稿写成的第二天，8月12日，胡耀邦就拿着先去征求邓小平的意见。他边读边讲，谈了两个小时。邓小平听完，赞赏地表示“很好”，并且说：“科技工作很重要，第一次汇报，长一点也可以。”他进一步指出，“主要先抓科学院本身的问题，要重点解决派性问题”，“还有班子问题。”

从邓小平那里回来，胡耀邦和李昌召集科学院各部门和各直属单位负责人开会，对《提纲》第一稿进行讨论。会议之后，快马加鞭，8月15日改出了第二稿，题目没变，结构没变，只是文字有些改动，增加了一些毛泽东论科学技术的语录。这一稿还分送给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负责人胡乔木、于光远，国防科工委主任张爱萍等人征求意见。他们分别提出了一些具体意见。胡耀邦日夜加班，只隔一天，8月17日就赶出了第三稿。这一稿题目和框架仍然不变，但又作了一些文字修改，一方面对某些提法作了进一步斟酌，如“如果我们的政治工作是反对钻研业务，那就是空头政治……”等等那一番话，都改得较为平缓。另一方面，对前两稿一些讲得不够充分的地方，又作了强化。比如对那些热衷于造反的人，就更加明确地指出，“有极少数人，受林彪修正主义路线的影响，这几年被派性迷了心窍，搞歪门邪道，在思想政治上并没有入党，却处处盛气凌人，以改造者自居；在业务上自以为是，指手画脚；在组织上只知有派，不知有党，动辄以我划线，打击异己，甚至公开与党的路线和党的领导相对抗。”胡耀邦对这种人深恶痛绝，在口头讲话时他更严厉地指出，这种人如不改变，就会成为法西斯。

胡耀邦把这份稿子送给邓小平，同时写了一封信。信中说：“送上我们多次反复修改的汇报提纲。这一稿在几个关键的地方是按你的指点改过的，有些地方是接受了参加讨论的一百多位同志的意见，乔木同志最后为我们做了很多很好的修改。这一个月我是把全部精力放在这个文件上的，用一句老话，是拼了一点老命的。我怀着一种渴望的心情，祈望得到你的进一步指点，祈望得到你对我们展开工作的支持。”

8月26日，邓小平把胡乔木找去，布置他主持《提纲》的修改，并要胡乔木转告胡耀邦、李昌：他们的稿子涉及的问题太多，不必要太锋利，这样站不稳。要他们少在群众中讲话，等提纲改好了，国务院通过了，毛主席批准了，让提纲自己说话，让群众在讨论提纲时自己说话。邓小平还说，这个文件很重要，要加强思想性，多说道理，但不要太尖锐。道理要站得住，攻不倒。胡乔木当天就打电话给胡耀邦，转达了邓小平的指示，告诉邓小平已将《提纲》交给他修改，请胡耀邦去政研室讨论如何修改。

8月27日上午，邓小平又找了胡耀邦去，提醒他要“慎重一点、平稳一点。《提纲》要缩短，原则都保留，棱角磨掉一些，写得平稳一些，修改工作由乔木办，你催着点。”邓小平叮嘱胡耀邦：要发动群众，什么事，群众起来了就好办了，不管搞（掉）派性，搞规划，都是这样。可以先抓落实政策，搞好班子，要挑选有学问、有劲头、有组织能力的搞科技工作。

胡乔木接受修改任务之后，先让于光远组织修改。国务院政治研究室是由邓小平直接领导的单位，这一年的七月初才正式建立，它的负责人除胡乔木、于光远外还有吴冷西、胡绳、熊复、李鑫、邓力群，是一个“秀才”班子。任务是整理准备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文稿，以及撰写理论文章，收集文艺、教育、科学、出版方面的情况，代管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胡乔木为主要负责人。于光远“文化大革命”以前就是中宣部科学处处长，并兼任国家科委副主任，熟悉科学技术工作。他对《提纲》作了一些结构上的改动，压缩了篇幅，改写了一些地方，用了两三天时间拿出了一份草稿。但邓小平认为这个文件非常重要，要求胡乔木亲自负责。

8月31日，胡乔木、胡耀邦召集李昌、吴冷西、胡绳、于光远等讨论《提纲》的修改，科学院的吴明瑜、罗伟、明廷华，国务院政研室的孙小礼，教育部的甘子玉和龚育之也参加了讨论。胡乔木传达了邓小平显然是出于策略上考虑的意见：科学院起草的稿子太锋利，站不稳，要重新搞。科学院是个有争论的单位，所以每一句话都不能轻易去说，无论说什么都要好好考虑。要慎重，不要什么都讲得那么凶。话要少说，说多了，要说得稳妥很困难。胡乔木还对《提纲》如何修改提出了具体意见。他说，像第三部分的题目，就不要用“力求弄通”的讲法，这个讲法有徘徊的意思，要讲“坚决贯彻”。他提出：“要把主席（有关科学技术的）指示排一下，指示就是我们的路线、方针。”他还提出现在的稿子文字太陈旧，没有“文化大革命”以来写文件的那些语言。

接着，9月2日，胡乔木拿出了由他亲自执笔的修改稿，即《提纲》第四稿（未定稿）。这一稿在结构、内容、文字上都有很大改动，题目改为《科学院汇报提纲》，全稿由六部分改为了三部分。

9月3日，胡乔木将《提纲》第四稿的未定稿交给了邓小平。邓小平看后表示很满意，说这个文件很重要，不但能管科学院，而且能对整个科技界、教育界和其他部门也起作用。

《提纲》在完成第四稿之后，报送国务院审议。9月26日，邓小平主持召开国务院会议，听取科学院汇报。胡耀邦首先按《提纲》分几个部分简要汇报。李昌和王光伟也相继作了汇报。会上气氛很热烈，大家不断地插话，提出问题，共同讨论，邓小平兴致勃勃，在汇报过程中也插了许多话。

听完汇报，邓小平讲话说，科学研究是一件大事，要好好议一下。这一段时间一些科研人员打派仗，不务正业，少务正业，搞科研的少了。少数人秘密搞，像犯罪一样。陈景润就是秘密搞的。这些人还有点成绩，这究竟算是红专还是白专？像这样一些世界上公认有水平的人，中国有一千个就了不得。说什么“白专”，只要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好处，比只占茅坑不拉屎的，比闹派性的、拉后腿的人好得多。邓小平强调说，对于那些一不懂行、二不热心、三有派性的人，为什么还让他们留在领导班子里？邓小平还着重谈了教育问题，他说，我们有个危机，可能发生在教育部门，把整个现代化水平拉住了。究竟大学起什么作用？培养什么样的人？有些大学只是中等技术学校水平，何必办成大学？一点外语知识、数理化知识也没有，还攀什么高峰？中峰也不行，低峰还有问题。要解决教师地位问题。几百万教员，只是挨骂，怎么调动积极性？

会上原则通过了《汇报提纲》。

胡乔木等根据邓小平的指示，于9月28日改出了第五稿。这一稿作为定稿，以胡耀邦、李昌、王光伟三人的名义上报，由邓小平转呈毛泽东。

这时的胡耀邦，有一种完成一件大事的轻快心情，只等着毛泽东的批复了。同时，他的内心也有一份苦涩和几分遗憾。他认为援引罗列那么多毛主席语录，必要性究竟大不大；对初稿中理论性论述的部分被删去，深感惋惜。结束了《汇报提纲》的起草工作，他继续开展科学院的各项整顿。

◇ 又被打倒

万万没有想到，《汇报提纲》上引用的一条毛泽东语录惹出了麻烦，最后是前功尽弃。

原来，在报送毛泽东的《汇报提纲》第二部分里，以黑体字引用了毛泽东的一句话：“科学技术是生产力”。《提纲》送上以后，邓小平去毛泽东那里汇报，毛泽东说不记得说过这句话。邓小平说马克思也讲过这样的话，毛泽东还是说记不得自己说过。邓小平说，请主席把稿子退回给我修改，毛泽东没有退。从来都是善于从一件具体事情入手破解全局的毛泽东，这个举动显然不在于对一条语录有异议，而是隐约表明了他对这个文件的不满了。

直到10月24日，毛泽东才把《汇报提纲》退还给邓小平。邓小平又找胡乔木修改，改出了《汇报提纲》的第六稿。然而这时又“风云突变”，形势急转直下，首当其冲的正是邓小平，因此这次的修改稿就没有报送了。

形势的逆转，源于刘冰等人给毛泽东写信事件。

刘冰是一位老干部，当时任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1968年，解放军八三四一部队宣传干部迟群、中央办公厅机要局干部谢静宜带领工人宣传队进驻清华大学，以后迟群任清华大学党委书记、谢静宜任副书记，他们很快成了江青的亲信，跟着“四人帮”兴风作浪。他们作威作福，独断专行，任人惟亲，搅得清华乱上加乱。特别是四届全国人大以后，野心勃勃的迟群没有得到提升，便消极怠工，酗酒滋事，发泄怨气，闹得一塌糊涂。他们的种种恶劣表现引起许多干部和师生的强烈不满，早已忍无可忍的刘冰，便同另外三名校党委负责干部惠宪钧、柳一安、吕方正于8月间写信给毛泽东，揭发迟群。但这封信根本无法直接送到毛泽东那里，刘冰等觉得由邓小平转最为合适。可是又怎样才能送交邓小平呢？他们想到了胡耀邦。

刘冰早年也是青年团干部，是胡耀邦的老部下。在此之前，他去探望胡耀邦时，就曾谈到过有迟群、谢静宜这么两个人，闹得实在太不像话。这次他来到胡耀邦家，说了写信的事，胡耀邦表示：“我支持你”，并且说：迟群、谢静宜“他们哪里是干革命，是投机嘛。这种人在咱们革命队伍中不是个别的”。他把信仔细看了一遍，说：“信要实事求是，要注意用事实说话。……你们信里的‘装疯卖傻’，‘乱蹦乱跳’，这些就是形容词，是空话嘛。”刘冰说明了实际情况就是如此，同时提出请胡耀邦将信转给邓小平。胡耀邦说，科学院和清华大学不属一个组织系统，由他转信不合适。他把邓小平的地址和邓小平秘书的电话号码告诉了刘冰，说由他们直接把信送到邓小平家就可以了。

邓小平见到信后，立即递交给了毛泽东，毛泽东没有反应。刘冰等出于急切解决清华问题的心情，10月间又写了第二封信，这封信将谢静宜的问题也讲进去了。这回他们托人送给了胡乔木，胡乔木送到邓小平那里，邓小平又转呈给了毛泽东。

本来，邓小平领导的整顿工作，已经触及了“文化大革命”的极左错误，逐渐发展成为对“文化大革命”的比较系统的纠正，这已是毛泽东所不能容忍的。加上邓小平又不肯回应毛泽东关于“文化大革命”七分成绩、三分错误的评价，更使毛泽东不快。这回毛泽东在看了又是由邓小平转来的信后，他说，清华大学刘冰等人来信告迟群和小谢。我看信的动机不仅是想打倒迟群和小谢，他们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的。我在北京，写信为什么不直接送给我，还要经小平转。小平偏袒刘冰。一直窥伺毛泽东意图的“四人帮”于是借机发难，叫嚷说这是右倾势力回潮，邓小平再次陷入被动。刚刚露出曙光的天空，霎时又阴云密布。

11月中旬，“四人帮”策划要清华大学党委向政治局作汇报，以借机闹一场。11月15日政治局开会，叶剑英、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等政治局委员参加，作为毛泽东联络员的毛远新以及迟群、谢静宜也参加了。毛泽东指定参加了邓小平“整顿”工作的胡乔木、胡耀邦、周荣鑫（教育部长）、李昌以及刘冰参加，说参加会议也是一种帮助。胡耀邦和李昌事先得到通知，要准备就科学院的整顿中的“错误”作检查。会上，迟群、谢静宜否认刘冰对他们

的揭露，然后“四人帮”就一致对邓小平大肆攻击。

第二天晚间继续开会，由被“帮助”的五个人作检讨。胡耀邦第一个站起来，大声说：“我讲些意见。主席要我们五位同志来参加会，是对我们的关怀，我在这里对主席表示衷心的感谢。昨天晚上，王洪文副主席对我讲了许多话，我在这里郑重声明，他说的那些问题我没有，说我说了什么话，我没有说过，请求中央查证。”对于替刘冰转信一事，他说：“我对他说过我支持你，但我们不是一个组织系统，信要由你自己送”。他讲完后，王洪文没有吭声，会场上好久没有人说话。

高层的动向很快传到清华、北大，在社会上掀起了铺天盖地的“反击右倾翻案风”的狂风恶浪，开展了对邓小平的批判。与此同时，也展开了对《汇报提纲》的批判。由于《汇报提纲》的第五稿里有大量毛泽东语录，难以下手，“四人帮”竟将最早的第一稿拿出来作为靶子。他们动用了一切宣传机器，使用了一切吓人字眼，企图全面推翻已见成效的整顿工作。

从此，科学院“四人帮”帮派分子卷土重来，自行改组了科学院党的核心小组，胡耀邦和李昌等停职反省。

胡耀邦再次过起了家居生活。为了进一步弄清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个观点，他细细研读马克思的原著，包括《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这部马克思的笔记性著作一共有四册，七八十万字，译文艰涩，读起来十分吃力，胡耀邦静下心来，硬是一字一句读下去。那时于光远常去看望胡耀邦，他们一起从这部书的《资本的流通过程》部分中找出了五条马克思关于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论述，两个人认真领会了这些论述的含义。后来于光远追述说：“在讨论中看到耀邦对马克思的这本书看得很细，也理解得很清楚。”“我没有见过任何一个做实际工作的老同志肯下功夫啃这样难读的著作。”

胡耀邦在科学院的工作，前后共一百二十天，他对自己的这一段工作是满意的，只是万万想不到就此中断了。他曾对人说，这是又一次“百日维新”，要真正做点工作太难太难。

□ 《胡耀邦传·第一卷》

~~~~~

【文革一页】

“文化大革命”之火是怎样在体育界燃烧起来的

· 余 樵 ·

中国体育界在“文化大革命”中是一个“重灾区”。

这个“重灾区”的灾情是怎样发生的？“文化大革命”之火，是怎样在体育界燃烧起来的？

◇ “文革”时谁会向往奥运会？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时光流逝，当年体育界的种种“革命”举动和“革命”的精神状态、思维方式，如今已被不少人有意或无意地淡忘了。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十年之后，曾有一篇以游泳运动员为主角，以“文革”武斗为背景的短篇小说《无人知晓的世界纪录》，后被改编为同名电视剧，二者都是

佳作，都曾获奖，但其中一个细节所反映出来的问题，却是这种淡忘的一个例证。

那篇短篇小说及同名电视剧，讲一个游泳运动员吴波，在造反派武斗冲突中，被一派群众组织怀疑其向另一派泄露了该派的武斗行动计划而致使该派遭到伏击，损失惨重，他因而被“判处死刑”，他在被昔日好友枪杀之前，提出唯一的要求：让他最后游一次泳，就在这一次，他竟拼尽全力打破了当时的奥运会自由泳纪录——但却是无人知晓的世界纪录。小说写到吴波在游泳池里作最后的冲击时，有这样一段描写：在吴波想象中，“奥运会的旗帜正在高高飘扬。观众台上无数的眼光集中在吴波身上……”电视剧里也出现了同样的镜头，出现了奥运会的五环旗……

这个细节，十分典型地反映出有关创作者忘记了或者是根本不了解“文革”时期人们的精神状态和思维方式。

历史的真实是，在“文化大革命”时期，一般中国人对奥运会、对五环旗，全无任何概念，不但不能想到去奥运会夺标领奖，而且根本就对奥运会这类“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玩意儿不屑一顾，嗤之以鼻。这种认识与感情，早在“文化大革命”之前就已经日积月累地形成了。

不妨回顾一下那段已被淡忘的历史。

在“文化大革命”之前，在作为“文革”序幕的“四清”运动、反修教育时期，1963年11月10日到22日，中国就已经与印度尼西亚、柬埔寨等国家在印尼首都雅加达组织了第一届“新兴力量运动会”，以“新运会”对抗奥运会。

事情的起因是，1962年9月，在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举行第四届亚洲运动会时，以苏加诺为总统的印尼政府拒绝台湾国民党当局派出的体育代表团和以色列体育代表团入境，国际奥委会认为印尼当局此举使“组织比赛的规则未得到尊重”，于1963年2月7日在瑞士洛桑举行的执行委员会上通过了决定：“不定期地禁止印度尼西亚参加奥林匹克运动会”。印尼政府迅即声明：要“更自由地组织一个不受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分子影响的新兴力量运动会”。中国国家体委和全国体育总会为此发表声明，称国际奥委会主席“布伦戴奇之流只不过是帝国主义，特别是与世界各国人民为敌的美帝国主义的走卒。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在这些败类的控制下，堕落成为帝国主义的政治工具。”

中国成为新运会最坚定的支持者，派出了以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体委主任贺龙元帅为首的庞大代表团。新运会开幕后，有关新运会的报道占据了报纸的大量版面，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开播专栏节目，大型彩色电影纪录片在全国放映，人们观看后无不欢欣鼓舞，以为革命的“新兴力量”国家终于也有了自己的“革命”运动会了。

《人民日报》为新运会胜利闭幕而发表的社论《丰硕的果实，锦绣的前程》中，斥责“帝国主义操纵的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及某些国际体育组织，千方百计地（对新运会）进行干涉和破坏活动。”

中国国家体委副主任、中国出席第一届新运会体育代表团团长荣高棠在《团结斗争的胜利，新兴力量的胜利》一文中，称奥运会国际委员会是帝国主义垄断国际体育活动的“御用工具”，并宣称第一届新运会的胜利举行和相应的新运会国际体育组织的诞生，“标志着国际奥委会垄断、操纵国际体育活动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摆脱了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控制的国家和人民是完全有力量来独立自主地组织自己的体育活动，发展自己的体育事业的。”



1964年7月5日新华社报道，中华全国体育总会负责人（就国际奥委会撤销对印尼的处分）发表谈话中指出：“众所周知，在美帝国主义的指使下，国际奥委会打着‘体育不问政治’的幌子，招摇撞骗，倒行逆施，到处制造政治阴谋活动。”“国际奥委会的种种罪恶行径，使世界各国人民，首先是新兴力量人民，日益认识到它作为帝国主义工具的反动面目，对它进行了严厉谴责和反对。”

1964年10月7日《体育报》发表的《高举团结反帝的旗帜——漫谈我国国际体育活动十五年》一文中，就一方面谴责“操纵在美帝国主义分子布伦戴奇手中的国际奥运会一贯敌视各国人民和中国人民，在国际体育活动中，推行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一方面宣称“反映着亚非拉各国人民革命意志的新兴力量运动会在全世界放射出耀眼的光辉”。

在国家体委于1965年初举行的全国体育工作会议上，“到会同志一致认为……在国际体育活动中，发展了反帝斗争的统一战线，同印度尼西亚等新兴力量人民一道，建立了革命的国际体育组织——新兴力量运动会联合会”。

在“文化大革命”之前尚且如此，在“革命情绪”更为狂热的“文革”时期就更不用说了。1966年8月14日，新华社报道：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发言人就一些西方通讯社不断散布“中国希望参加一九六八年奥林匹克运动会”的谣言发表谈话，称这是“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的新阴谋”，并且重申：“中国人民和运动员绝不同充当美帝国主义政治工具的国际奥委会发生任何联系。”

在这样的时代气氛下，在这样的反复宣传灌输下，不要说造反派“战士”了，就是一般的运动员，也不可能想到去“帝国主义垄断和操纵”的奥运会上领奖，因为在当时人们的心目中，那绝不是光荣而只能是耻辱。

#### ◇ “亚新会”风波

在第一届新兴力量运动会之后不久，新运会的主要发起国印度尼西亚因发生军事政变而政权更迭，倒向了“帝、修、反”阵营。从此，这个“反映着亚非拉各国人民革命意志的新兴力量运动会”再也没有举行第二届。

到“文化大革命”全面爆发时，正值1966年12月第五届亚洲运动会将在泰国举行。而在当年，亚运会与奥运会一样是被视为“帝国主义操纵和控制”的，因此，“新兴力量”国家为了与之对抗，决定抢先于11月25日在柬埔寨首都金边举行第一届亚洲新兴力量运动会（简称“亚新会”）。中国自然是这一运动会的主要发起国和参加国。

然而，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使得一切都乱了套。随着1966年10月中央工作会议的召开，全国开始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凡是在前一段时间领导过工作组，在群众中开展过揪“牛鬼蛇神”、抓“反革命”运动的领导干部首当其冲，无一幸免，国家体委副主任、中国新兴力量运动会主席荣高棠，自然也不例外。体育学院的红卫兵和国家体委的一些激进青年，率先以大字报向荣高棠展开了“炮轰”。于是，围绕荣高棠能否带队出国参加亚新会一事，一些运动员与体育学院和国家体委的造反派（当时是少数派）发生了尖锐对立。在此情况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决定荣高棠暂不出国。

1966年11月2日下午，由国家乒乓球队、游泳队、羽毛球队、体操队等准备参加亚洲新运会的运动员组织了个“出国誓师大会”。当时许多体委干部和运动员并不知道兼任国家体

委主任的贺龙元帅已经自身难保，还向贺龙施加压力，把贺龙“请”到会场，又到贺龙家中去请愿，使贺龙有苦难言，十分难堪。11月4日，多数派一些出国运动员不按时上车出国，而到国务院请愿，给中央施加压力，要求让荣高棠带队出国，有人甚至提出“荣高棠不出国，我们也不出国”。

11月4日当晚，刚在3日主持了毛泽东第六次检阅红卫兵大会的周恩来，不顾疲劳，与陶铸、贺龙、陈毅——“三个副总理，四个政治局委员”一起接见了中国参加第一届亚洲新兴力量运动会体育代表团的全体成员，用周恩来的话说，是运动员们“逼我来了”，他恼怒地说，我昨天晚上从天安门回来——早上七点到晚上七点，一天十二个小时，从天安门回来听到这个情况（指运动员誓师大会），心里非常不愉快。他以运动员们从未看到过的严肃（甚至可以说是疾言厉色）的态度训斥说：“你们立场站错了”，“没想到你们思想这样落后，我大吃一惊。”“开誓师大会弄四、五千人为什？这就是对付另一部分不赞成荣（高棠）出国的同志，向他们示威。对象搞错了，应向美帝、苏修、东南亚和印尼反动派示威，怎么能向红卫兵、同学示威呢？”“红卫兵对你们有意见，是有道理的，要挖错误根子。不是偶然的，是必然的，不在这事上就在别的事上表现出来。”他明确宣布：“原来考虑荣出国，现在看来不能出去。政治局常委讨论时，我要提这个问题，我不能答应你们的要求，相反要责备你们。”他还当场点名质问乒乓球运动员、前世界冠军徐寅生，要徐当众承认犯了“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错误，并要徐写一篇短文章（实为检查），再“活学活用”一次。周恩来还说，最近有人到贺龙家请愿不走，跟老总磨，这样做不对，我听到这个情况非常不愉快。

当时排序于周恩来之下的中央第四号领导人陶铸，在接见时的讲话中也明确说：“出国不出国完全是国家的权利”，“荣高棠不让他出国，因为体委有路线错误不检讨，你们可以提意见，出不出国由中央和毛主席决定。”“你去就胜利，不去就不胜利，那还叫什么体育队？谁领导都可以，只要不是右派，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贯彻毛泽东思想就可以。原来打算叫（荣）去，想开幕式，闭幕式去一下，很快就回来，现在更不能去了。我们和他做工作，他不觉悟，而且搞得这样复杂，一点觉悟也没有，走了怎么行？”

贺龙也不得不表态说：“昨天想了一个晚上，你们一个同志拍了桌子，火气不小，把我吓住了，把矛盾上交了。”他要求运动员们对这次“错误”“要从根子上挖。是两条路线的问题，一条是毛主席教导的，听党的话；一条是资产阶级的，不从这个根子上挖不行。谁反对毛泽东思想，谁反对毛主席，我就反对谁，是这样一个问题。前天开誓师大会，接了请帖很犹豫，未问清楚，本来出国有几百人，讲讲话，一去看到一礼堂人，知道糟了，要我讲话，我就不讲话了。不该开的会，错误的会。（陶铸插话：放荣高棠同志回去开三级干部会，结果开了誓师会。）我不叫荣高棠讲话，他讲了话，而且慷慨激昂！（陶铸：他不应该去。）……前天这样做对荣高棠没有好处，加重了他的错误，他认为有人拥护他。”贺龙还将保荣高棠的行为上纲为是“跟毛主席走还是跟哪个走？”

这场亚新会风波，在体育界是一次大地震。它直接导致了体育界的动乱。许多本来对“文化大革命”抵触不满的运动员，受到周恩来、陶铸等中央领导人如此严厉的斥责之后，被迫“转弯子”，纷纷“幡然悔悟”，决心“站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徐寅生后来就在一次大会发言中说，周恩来总理在这次接见中“对我们进行了严厉的但是又是语重心长的批评，作了重要的指示，这是党和中央首长对我们最大的爱护……这是总理在挽救我，希望我能够通过学习毛主席著作，迅速的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

#### ◇ 世界冠军被迫造反

“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要求“六亿人民都是批判家”，由国家培养的专业体育运动员也

被迫投入政治斗争，被迫起来参加“革命大批判”，参加“造反”。这也是另一种“史（国际体育史）无前例”。

在亚新会风波中，周恩来点名批评了徐寅生，并责令他写出检查，再“活学活用”一次——徐寅生在“文化大革命”前对中国乒乓球女队作过一次题为《关于如何打乒乓球》的讲话，通篇按照当年的时尚，以“活学活用”毛泽东著作中的“辩证法”思想来指导打好乒乓球，讲话经“笔杆子”整理成文后，呈报给了毛泽东，得到毛泽东的高度赞赏，批示下发，《人民日报》于1965年1月17日加编者按全文发表（在编者按中传达了毛泽东的批示精神），紧接着，1月18日《解放军报》发表社论《更好地学习毛泽东思想更好地运用辩证唯物论》，《体育报》发表社论《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学习辩证唯物论反对形而上学促进体育工作革命化》，1月19日《中国青年报》发表社论《一篇充满辩证唯物论的好作品》，1月25日新华社报道《关于如何打乒乓球》一书已经由人民体育出版社出版……这篇讲话及有关宣传反过来又推动了全国“活学活用”毛泽东著作的“群众运动”。而“文化大革命”正是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又一场“群众运动”，周恩来要徐寅生再“活学活用”一次，当然就是要他好好领会毛泽东的“战略部署”，跟红卫兵、造反派站到一起，“紧跟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周恩来的话一向被体育运动员们奉为主臬。谁还不赶快响应毛泽东的号召，参加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参加“造反”？这在当时从根本来说就是“跟毛主席走还是跟哪个走”的大是大非问题。

当问题变成“跟毛主席走还是跟荣高棠走”的时候，运动员们还能有另外的选择吗？

1967年初，前世界冠军庄则栋贴出《我造反了》的大字报，检查了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控制和蒙蔽，“保荣高棠”的错误，决心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并郑重声明退出保字号的“红卫战斗兵团”。

庄则栋跟徐寅生一样，当时也是体育界耀眼的明星，他于1961年4月在北京举行的第二十六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获男子单打冠军。1963年4月在布拉格举行的第二十七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获男子单打冠军。1964年10月北京举行国际乒乓球邀请赛，徐寅生获男子单打冠军；庄则栋、徐寅生获男子双打冠军。1965年4月南斯拉夫卢布尔雅那举行第二十八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庄则栋获男子单打冠军；林慧卿、郑敏之获女子双打冠军；庄则栋、徐寅生获男子双打冠军……

这些前世界冠军，在“文革”风暴突然降临时，都还是些二十来岁的年轻人，他们曾经处于荣誉的巅峰，而且一旦成为世界冠军，就同时会得到一系列的荣誉头衔、社会职务和相应的政治地位。他们从来所受的教育都是“听话要听党的话”，当荣高棠已经不能代表“党”了，只有周恩来、陶铸等“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领导人能代表“党”说话的时候（陶铸很快也被打倒而不能代表“党”了），当他们突然之间被“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领导人斥为“立场站错了”、“思想这样落后”，又被自诩为“誓死保卫党中央、誓死保卫毛主席”的红卫兵、造反派骂作“保皇派”、“修正主义苗子”的时候，他们能受得了这样的打击和羞辱吗？他们能不赶快认错以跟上“革命”的潮流、挽救自己的“政治生命”吗？

1967年6月6日，江苏省体育战线革命造反派联合委员会等群众组织在南京召开了控诉斗争荣高棠大会，前世界冠军林慧卿在大会上作了长篇“控诉”发言。

1967年6月10日，江苏省体育战线联合会主办的《体育战线》报第十期发表了前世界冠军徐寅生在批判荣高棠大会上控诉贺龙、荣高棠这个“贺荣修集团”的长篇发言，沉痛检

讨“我由于世界观没有改造好，站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立场上，成了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荣高棠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工具，对党对毛主席对革命人民犯了罪！我要向毛主席请罪！向革命人民请罪！……”

当造反已经成为时代主潮，而造反派内部却又开始打起内战来了之后，1967年9月4日，周恩来在接见首都体育界革命群众组织代表的讲话中号召：不同观点的革命组织在大方向一致的前提下联合起来，把矛头对准刘、邓、陶，以及贺龙、荣高棠。这就是大方向。

响应周恩来的号召，体育界造反派迅速行动起来抓“大方向”。9月23日，《人民日报》报道《国家体委系统革命群众向中国赫鲁晓夫及其代理人发起总攻击 / 狠揭狠批修正主义体育路线》，称“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及其在体育界的代理人，疯狂推行修正主义体育路线，阴谋复辟资本主义，罪行累累。在当前革命的大批判中，国家体委系统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决心把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放在高于一切，大于一切，先于一切，重于一切的地位，使革命的大批判和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紧密结合起来，把轰轰烈烈的群众性的批判活动和扎扎实实的专题批判紧密结合起来，彻底肃清修正主义体育路线的流毒，把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插遍整个体育界，高高飘扬，永远飘扬！”

当初贺龙也没有想到，他向运动员们提出的“跟毛主席走还是跟哪个走？”转眼就会作茧自缚地变成“跟毛主席走还是跟贺龙走？”按照这样的思维逻辑，运动员们不得不纷纷与他划清界限，“彻底决裂”了。

“文化大革命”的烈火，就是这样在毛泽东的号召和部署之下，在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最初还包括贺龙在内）的严词督促、苦心引导之下，在体育界熊熊燃烧起来的。

就这样，按照毛泽东的“伟大战略部署”，中国体育界终于走到了历史性的1968年5月12日，这一天，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命令》（时称“五一二命令”），宣布：“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包括国防体育俱乐部系统），是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伙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贺龙、刘仁、荣高棠等完全按照苏修的办法炮制起来的，长期脱离党的领导，脱离无产阶级政治，钻进不少坏人，成了独立王国。……特决定全国体育系统全部由中国人民解放军实行军事接管”。以“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名义针对一个专业系统发出这样严厉的《命令》，即使是在“文革”中也是少有的。在国际体育史上当然更是史无前例。

后来有文章称“五一二命令”的发布使这个月成为“体育系统最黑暗、最恐怖的日子”，这个评价应该是代表了当时广大体育界人士的普遍感受。但该文却称“五一二命令”是林彪、“四人帮”一伙“盗用中央名义”发布的，这显然有违史实，谁也不会相信，在当时的体制下，对全国体育系统实行军事管制的《命令》竟会不经毛泽东审定批准。

更大的灾难降临到中国体育界……

就在这个《命令》下达四天后的5月16日，中国乒乓球第一个全国冠军、中国乒乓球队教练、北京乒乓球队总教练姜永宁不堪“文革”迫害，上吊自杀。

紧接着，6月19日深夜（20日凌晨），中国乒乓球第一个男子单打世界冠军、中国乒乓球队女队教练容国团不堪“文革”迫害，上吊自杀。

加上在此前的4月16日不堪“文革”迫害上吊自杀的中国乒乓球队男队教练傅其芳，这三位从香港归来一心为国争光的“乒坛三杰”，相继成为毛泽东“文革”祭坛上的牺牲。

“文化大革命”那场“史无前例”的野火被毛泽东一手点燃，至今已近四十年了。然而，那段被数亿人刻骨铭心经历过的历史，却仍有许多真相遭到人为的粉饰、掩盖、扭曲。本文所谈，不过是小小一例。要真正“正本清源”，显然还任重道远。

~~~~~

【往事回首】

《红卫兵兴衰录——清华附中老红卫兵手记》（节选二）

（1966年7月—8月）

• 宋柏林著 • 余汝信编注 •

1966年7月27日 星期三 晴

清晨2、3点就贴出红卫兵的二论、三论造反精神，并贴出了红卫兵、革委会号召向工作组错误言行开火的号召书。顿时全校翻腾，人心所向。这回可惨了，没一个敢说红卫兵一个“不”字的，都纷纷起来响应，给工作组贴大字报。此时一切权力实际上已归了革委会、红卫兵。工作组的人已经不见影了。下午去支援外语学校左派，那里右派，地、富、反、坏、右猖狂太甚，真把我气炸了！

晚上又传来好消息，罢了海淀中学文革领导小组组长周捷的官。这是利用他们召开的所谓经验交流大会会场，北大附中的闯进去，就喊造反了。我们很晚才赶到会场，后来又跟北大附中彭小蒙干了一仗。看来她尾巴翘太高了，把各校左派的兄弟关系看成老子、小子关系，实在感到痛心。校内一边倒的形势实在不妙，看明天的辩论会能不能开。

注：彭小蒙，女，与清华附中“红卫兵”几乎同时成立的北京大学附中“红旗战斗小组”负责人。

周捷，又作周杰，据李雪峰7月29日讲话，为“海淀区中学文化革命工作队队长”。

1966年7月28日 星期四 雨

晚上到展览馆电影厅开全海淀区左派学生与周捷辩论会。江青、陈伯达、康生、王任重、刘志坚、□□、戚本禹、李雪峰等都出席了大会，全场热烈鼓掌，欢呼“毛主席万岁！”

我们清华附中红卫兵最后发了言，读了三篇造反精神万岁。江青等同志很注意我们的文章。

最后江青同志发了言，真是太好了，句句都热烈鼓掌，因为没一句废话，都是中央指示精神。同意撤走一切工作组。第一句话就大力赞扬支持我们造反。并同意立即召回军训同学等等。真是太好了！

李雪峰作了检讨，看样子很不高兴，也可能是难过吧，也可能是别的。

大会开完后，我们和人大附红卫兵，石油附赤X又与北大附红旗争论了好几个小时。

我们认为他们的作法是错误的，在这个原则问题上我们不能让步。

注：出席首长中空了一个名字，因宋对其名字比较陌生，当时没能记上。江青在今日的讲话中称：“我们坚决赞成你们这个造资产阶级反的精神”，“我们同意你们的意见，建议撤销工作组，罢周杰的官，你们自己完全可以成立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或者文化革命代表会议”，“很多人递条子讲，什么军训，集训，要求那些同学回来参加文化大革命，我们完全赞成”。有关这次大会上清华附中红卫兵将一论、二论造反精神万岁的大字报交江青转给毛泽东的略况，参见骆小海序。

1966年7月29日 星期五 晴

今天是我最最幸福的日子了，我见到了毛主席!!!

下午3点半在大会堂参加北京市大、中学校文化革命报告会。刘主席、周总理、朱德、邓小平、李富春、陈毅、董必武、陈伯达、康生、江青、陶铸、李雪峰、薄一波等等几乎所有的中央、军政首长都去了。当刘主席等走进会场时，我们多么高兴啊！我们最热烈地鼓掌，欢呼！

会议开始，李雪峰讲话，宣读了北京市委关于撤销工作组的决定。然后宣布：“现在请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同志讲话。”

我们不禁大喜，真是太幸福了，能听到中央负责同志的报告，太好了。小平同志全面地谈了文革的形势、经验、教训，这是一篇新的总结。小平同志讲得很严肃，是念稿子的。不很长，精悍。

小平同志讲完话，雪峰同志又宣布：“现在请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来同志讲话。”我出乎意料，本以为听了小平的报告就十分了不得了，没想到总理也讲话了！总理主要是讲运动如何自己开展，中央负责人如何下来支持并学习群众革命。总理讲得很随便，像是在聊天，又风趣。领袖们真是太谦虚了。总理说：我们当初出来时那像你们这样多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我们都感到惭愧。因为你们现在是在毛泽东时代！我们听了万分感动，领袖都这么谦虚，我们还讲什么呢？总理讲完了，这时雪峰同志又宣布：“现在请中共中央副主席”还没说完我们已经高兴得跳了起来，拼命的鼓起掌来。这时刘主席走向讲台，总理、小平同志首先起立鼓掌，我们一起都起立，掌声经久不息。这真是太幸福啦！！刘主席讲话也和拉家常一样，太谦虚了。领袖们都是这样，一再表示要当小学生，向大家学习，是“老革命碰新问题”。并说：自己过去只懂一点，还不如你们，后来在斗争中学，失败中学，现在才懂得了一些。这是多么多么谦虚的品质啊！我感动极了。领袖们对我们多么信任和关怀啊！真是最大限度地放手发动了群众。少奇同志讲话很生动，手势很多。最后他高呼：“革命的师生万岁！”、“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

呼声未了，掌声骤起，毛主席来了!!!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了。我毫无思想准备。这时，张明还在旁边问：“什么人？什么人？”我捅著他的胸大声喊道：“毛主席。”，我忽地冲向前去，冲开人们，冲到了二楼最前面。我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和激动，使劲地鼓掌，大声地高喊：“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我从未这样激动过，高兴过。主席的关怀，象一股暖流一下通遍全身，感到浑身是劲。主席，中央各首长这么关怀我们，信任我们，支持我们，鼓舞我们，我们还有什么话可说呢？回去好好干，一定要干好！主席红光满面，健步地走来走去。我太幸福了，太高兴了。眼中不禁渗了泪花。

主席走了，首长都走了，我们还在鼓掌高呼：“毛主席，万岁！！”最后全场齐唱“大海航行靠舵手”。我尽情的高唱。但激动地闪着泪光，竟有些唱不出来了。我太激动，太高兴了。我一定不辜负主席和中央首长们的关怀，期望，一定把文化革命搞得好好的，为全中国、全世界人民和革命作好贡献！

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注：本日大会的正式名称是北京新市委召开的北京市大专学校和中等学校师生文化革命积极分子大会。毛泽东以此形式要此前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刘少奇、邓小平为撤销工作组一事公开作出说明，以承担派工作组的责任。

根据记录，邓小平在会上称：“我们对待这样新出现的问题，采取了派工作组的办法，我们这个决定是比较仓促的；还有的决定，例如中学集训、军训等问题的决定，也是比较仓促的。”刘少奇称：“怎么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你们不太清楚，不太知道。你们问我，怎样革命，我老实回答你们，我也不懂得，我想党中央许多同志、工作组人员也不晓得。真是老革命遇到新问题。有时没犯错误人家也说你错了，是不是？有时候自己也莫名其妙。”

据文革中普遍流传的说法，7月26日，毛泽东曾严厉指责道：凡是镇压学生运动的，都没有好下场。满清镇压学生运动没有好下场，北洋军阀镇压学生运动没有好下场，蒋介石镇压学生运动没有好下场，北京大学陆平、彭佩云镇压学生运动有好下场吗？清华大学蒋南翔镇压学生运动有好下场吗？派去的工作队有些又镇压学生运动，也没有好下场。

1966年7月30日 星期六 阴
回到家里，一星期未见，也是天翻地覆了。
看了“柜台”电影，让人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

1966年7月31日 星期日 晴
晚上到军事博物馆，参加军民大联欢，节目很多，我都看不过来了。
晚上遇到了方海青，他们放假“休息日”才到北京来的，能在这人山人海相遇真是不简单啊！我给他介绍了北京文革的情况，他很有兴趣，很想马上回去造反。

注：方海青，宋在广州八一中学时的同学。时方父调北京工作，方在上海海关学校就读。

1966年8月1日 星期一 阴
上午组织同学到颐和园横渡昆明湖，没淹死一个真是万幸。
晚上组织晚会，几乎都是工农、革干子弟和红卫兵战士登台表演，最后一起扭起秧歌舞来，好不快活。

1966年8月2日 星期二 晴
一天，跑了矿院、石油、人大等附中。这几天，来访、求援的学校川流不息，很是忙乱。我们切不可有半点“老子左派”的架子，要最虚心，最热情地帮助，学习大家。
从矿院附中那得到主席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信，最热烈地支持我们的造反。我真是乐开了花，我们一定要好好地干，全心全意为全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服务！

注：毛泽东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信，于8月1日作为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文件发予与会者。该信日期虽署为8月1日，但因毛早于7月31日已将该信及附件（即清华附中红卫兵分别写于6月24日、7月4日的《革命的造反精神万岁》及《再论革命的造反精神万岁》两张大字报）交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陶铸及中央文革小组各人阅看，故该信写作时间实应为7月31日或更前。惟原信当时及以后都未交至清华附中红卫兵手中。

宋是从住在他家隔壁的解放军政治学院院长蔡顺礼的儿子、北京矿业学院附中学生蔡竖谦处得到信的抄件的，而蔡是从其矿院附中的同学杨冀平（父杨勇，时为中共中央候补委员，北京军区司令员）处得到的。

1966年8月3日 星期三 阴
当前，虽然我校及海淀区搞得热火朝天，但就整个北京市及高等院校还是冷冷清清。
所以，当前的主要目的，怎样才能符合革命的最大利益，那就是四处去点火，把各校的工农革干子弟阶级觉悟启发起来，组织好本校的阶级队伍，到那时，我们才能回来，用较多点的力量整整自己的东西。“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
晚上开民主会，革委会的主要人在一起进行了批评和自我批评，我检查了自己个人主义，怕艰苦，怕挑重担等思想。我一定要树立起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老老实实地为人民服务。

1966年8月4日 星期四 晴
关于“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基本如此——鬼见愁”，这幅对联好得很。
矫往必须过正，不过正不得矫往。必须造成短时期的红色恐怖，非此不能消除彭真“重在表现”的余毒，不能使工农、革干子弟翻身，就不能把政权牢牢地把握在无产阶级的手中，就不能把文化大革命胜利地进行到底。
今晚清华开大会，周总理、邓小平、董老、陈伯达、陶铸、雪峰等许多中央首长都去了。

我校红卫兵代表讲了话，读了“造反精神万岁”。周总理后来讲了话，夸奖了我们的文章和革命精神。我们一定要戒骄戒躁，继续发扬革命的造反精神，把无产阶级革命进行到底。

不过我没参加大会，而与一些同学去进行另外一件极有意义的事情。我们到圆明园农场访贫问苦，挖场领导的黑线。一开始有几个也是贫农出身的总缠著我们，但穿得很讲究。我想：要想真正搞好运动，必须得到广大贫下中农的信任，要达到目的，得一进村就一头扎进最贫苦的屋子里去。否则，得到一个人而丢了大家，那是得不到贫下中农信任的。于是我们打听到一个九口人住一个小屋的老贫农，就寻将去，一头扎进小屋里，亲切地交谈起来。他叫于宪进，是个老贫农，生活很苦，他揭露了场里的很多坏事。我们又跟他讲了很多，鼓励他们贫下中农串联起来，自己当家作主人，自己闹革命。在贫下中农中间搞革命才是真正的锻炼，我有信心也有勇气到贫下中农中去锻炼自己，培养自己成为革命的接班人。

注：“血统论”盛行时期的这副引起极大争议的对联，宋认为“好得很”。彭真，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北京市市长。5月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已决定停止其中央书记处书记，撤销其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市长职务，时正在受到不点名的公开批判。周恩来今天在清华大学称：“清华附中红卫兵《三论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的大字报起了带头作用，响应了毛主席的号召。在这个问题上，我可以老实说，我应该向你们学习，向你们致敬。毛主席看了你们的两论革命的造反精神万岁，很称赞你们的革命勇气和革命首创精神。同学们，他们有大无畏的精神！”

1966年8月5日 星期五 晴

到外面跑了一个下午，到“中学生杂志”社，“女二中”、“芭蕾舞学校”、“电影学院”等地去。看来北京市的火已基本点燃，出去造反的任务基本完成。下星期可以转入正轨。

1966年8月6日 星期六 晴

晚上到天桥剧场开辩论会。江青、王任重、康生同志都讲了话。前两人着重强调团结大家闹革命。康生同志讲得特别好，解释了接班人的五个条件，并着重谈了阶级路线。赞扬我们不顾劳苦，四处奔走，就是为了一个目的，宣传和捍卫毛泽东的阶级路线，对此他表示钦佩。并大批团中央，说过去是“全民的团”，阶级路线很不突出。要我们红卫兵和红旗战斗小组的把阶级路线带到团里，作一个毛泽东思想的共青团员。并大大肯定了红卫兵、红旗等左派组织，让我们在革委会的领导下，很好地干革命。

注：江青当晚在天桥剧场的讲话中谈到“对联”时称：“我们觉得这样改比较妥当：父母革命儿接班，父母反动儿背叛。横批：理应如此”。又称：“有一个外语学院附中的红卫兵递了一个条子，没写名字，叫我表示明确态度，同意不同意那副对联。我不完全同意。道理也讲了，很简单，那种封建术语不能代表新的思想，这是匆匆忙忙拿出来的”。

康生称：“我很欣赏清华、人大、北航附中红卫兵的紧急呼吁书，这些呼吁书是什么呢？这是毛泽东思想的，马列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的，也就是一分为二思想的。”紧急呼吁书见附录6。

1966年8月7日 星期日 晴、雨

今后要多讲大方向，少树小框框。这样才能使群众目标明确，充分发挥积极性和创造性，生动活泼主动地搞好运动。上午孙正叔叔到家和爸爸、院长、政委等谈了一上午，要我们戒骄戒躁，好好干革命。

注：孙正（1918—1992），宋父战友。建国后曾历任43军兼海南军区政治部主任，广东省军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陆军第47军政委。1961年晋升少将。1965年8月任工程兵援越修路工程指挥部政委。本月，经陶铸提名由军队系统调京任中共中央文教政治部副

主任，国务院文教办公室副主任。

院长、政委，指解放军政治学院院长蔡顺礼（1914—），政委孔石泉（1909—2002）。

1966年8月8日 星期一 雨

红卫兵的老班底集中在五楼炮轰核心组，轰得很厉害、很好。

1966年8月9日 星期二 晴

中央颁布十六条，这真是“及时雨”。前段时期，敢打敢拼，是一员闯将。现在，政权打下了，自己当政了，这时才感到建设难啊。许多政策把握不住，正在头痛时，中央来了十六条。真是党和毛主席最知道我们的心意。

注：“十六条”，即正在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于8月8日通过、今日公开发表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

1966年8月10日 星期三 晴

挺身而出，担起革委会改选的担子。一定要走群众路线，放手发动群众。改选问题上就是这样，坐在办公室里什么都想不出来，好不容易想出来后在群众中也是通不过的。今天才走了几个班，听了一些意见，就采用了“大字报、大辩论、大鸣大放”的群众方法，并较注意突出政治了，群众也较满意。自己为什么能老老实实干一点事呢？主要是感到了压力，主席的信，万不能辜负，给主席拆台啊？有了一点责任感，去掉怕字，就能干一点事情。这就是一点经验。

但困难还在后面。现在有点沾沾自喜，是个人主义，目的不纯的表现，要立即制止。

注：革委会，即文化革命委员会。“十六条”称：“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和文化革命代表大会是群众在共产党领导下自己教育自己的最好的新组织形式，它是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权力机构”，“它不但适合于学校、机关，也基本上适合于工矿企业、街道、农村”。

文化革命委员会未及年底即渐式微。1967年“一月风暴”后被“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所取代。

1966年8月11日 星期四 晴

一天开两个辩论会。凡事怕认真，怕“敢”字。只要你敢干，干起来了，老老实实地干到底，总会干出来的，哪怕不太好。

这星期老老实实沉到学校里，较深入群众，狠抓改选工作。虽然任务很重，几乎就我一人抓改选。但依靠群众，群策群力，就能干出、干好。许多都是新的，你没干，没实践，怎能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只有干开了，才能从中吸取经验教训，才能锻炼成长。

在战争中学习战争。

1966年8月12日 星期五 晴

上午9点，选举正式开始。除了全校公认的右派以外，全校一起无记名投票选举。各班唱票后，由各班监委在全校面前唱票。这也是一个新创举啊。选举结果，共有1136人选举，我有1127票。这是同学们对我的信任，不过也是由于自己过去出头少，办事少，所以犯的错误也少。

马上开革委会，讨论分工，设一个主任：王铭，一个政治指导员：我，三个副主任：张小宾、卜大华、杨盘。下属三个组，政治组（学毛选，红卫兵），宣传组（对内、对外联络），内务组（保卫、军训劳动、生活管理）。我主动担当革委会的政治班长，这个担子很重啊。一定要在工作中树立共产主义人生观，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晚上庆祝大会，庆祝十六条，毛主席接见群众及革委会成立，同学热情真高，自己排起节

目，敲起锣鼓，好不热闹。王铭、我、熊钢发言，都是高姿态，大快左派人心。

晚上看电影《青松岭》也是大快人心。

注：“十六条”称：“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的成员和文化革命代表大会的产生，要象巴黎公社那样，必须实行全面的选举制。候选名单，要由革命群众充分酝酿提出来，再经过群众反复讨论后，进行选举”。

清华附中今日根据“十六条”选出的革委会领导成员，全为红卫兵核心骨干。卜大为为预6 5 1班、杨盘为预6 5 2班学生。

1966年8月13日 星期六 雨

下午到钓鱼台，去写改选总结。

晚上见到王任重同志，与我和王铭谈了许久。谈到什么叫“威信”，即：信任。失去了大家的信任，就是只威不信。谈到当了干部就不能那么自由了，一举一动都要负责。

注：钓鱼台，即钓鱼台宾馆，时为中央文革小组驻地。王任重，时为中共中央候补委员，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二书记（本月在陶铸当选中央政治局常委后升任第一书记），兼武汉军区第一政委，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谈话的详细内容，宋已回忆不起来。

1966年8月14日 星期日 雨

昨晚公布了中共中央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里面把当前最重要的事情都讲到了，我要认真学习，认真领会，武装头脑，明确方向，将文化革命进行到底。

1966年8月15日 星期一

学习全会公报，认为当前这场文化大革命中，最重要的是两点：

1、群众路线。即：信任群众，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2、阶级路线。即：坚决依靠支持革命左派，团结一切可团结的人，孤立打击一小撮右派分子。

国内：1、国民经济正在持续地健康地向前发展，正在出现新的全面跃进的局面。2、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更加深入，全国学习毛著的群众运动更蓬勃，人民思想觉悟空前提高。

国际：正处于世界革命的新时代，各种政治力量正在经历著一个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的局面。

我国的对外政策，以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为最高指导原则。即：反帝反修，支持世界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建立起反美及走狗的最广泛的国际统一战线。今后的方向：“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们，克服从反革命修正主义和“左”右倾机会主义诸方面来的阻力，克服困难，克服缺点，克服错误，克服党内和社会上的阴暗面，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为实现第三个五年计划，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

- 1、有无产阶级雄心壮志，敢于标新立异。
- 2、把中国建设好，使它成为无产阶级铁打的江山，永不变色。
- 3、一定要解放台湾。
- 4、百倍警惕美帝侵略，并坚决消灭侵略者。

晚上有7个同学要跑到兰州去，我们认为兰州的情况很复杂，不知真假，而中央的精神是自己解放自己，反对大量外出。再者他们根本没通过领导，无组织无纪律。于是我、小宾、大华、小海等四个坐著摩托跑到北京站，找到了他们，最后还是走了。火车站真不象话，什么人都能走。我们什么都没带，也不要证明证件，也不问成分，我们还光著脚丫子，就混进火车上了，一迈脚就能上兰州，真不象话。后来我们又试探问：“到广州去行不行？”那人说：“为了

革命，都可以去，不用花钱。”这可能是一个阴谋。

注：去兰州串连事，参见骆小海序。

1966年8月16日 星期二 阴
批判工作组，杀进团中央。

注：8月13—15日，一些中学红卫兵占领了共青团中央机关办公大楼，团中央机关陷于瘫痪。8月13日，新任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富春代表中共中央在北京工人体育场群众大会上宣布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关于改组团中央书记处的决定。15日，李富春又在团中央机关大会上宣布成立临时书记处，原团中央负责人胡耀邦、胡克实、王伟、胡启立停职反省，并建议红卫兵撤出，各学校、各机关对团中央的错误可以继续揭发，用大字报小字报贴到团中央机关来。

清华附中红卫兵得知团中央改组后，今日即到团中央“造反”。

1966年8月17日 星期三 晴

昨晚把胡克实押回学校，“借”来斗争。我们几个单独与他谈了一阵，这小子猪一样肥，眼睛瞪得大大的，吓得走都走不动，抽烟拿火柴时手都发抖。

今天上午开大会斗争胡克实。这次大会准备很匆促，开得很没底，不很好。我很著急，想找几个人来喊口号，增强会场气氛，找不到。后想，自己应该顶起来，没人时能独挡一面，敢干，怕什么，所以自己也领著喊了几次。现在干革命，自己应争取机会锻炼，而不应退缩。

乱得很，心里很没底，应到同学中去走走、听听。《愚公移山》，每当我看到主席对胜利坚定不移的信心时，哪怕是最艰苦的时期，这大大地感染了我，感动了我。我现在的困难算什么呢？我们应该相信自己，相信群众，相信党和毛主席，清华附中一定能搞好。我们决不辜负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期望，最后的胜利一定属于我们——革命的红卫兵！

注：胡克实，已被宣布停职反省的原共青团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

1966年8月18日 星期三 晴

今天是我最最幸福的一天，一辈子最最幸福的一天。我会见了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并与他老人家握了手，谈了话。

早上二点，我们就起身出发，奔赴天安门广场，参加百万人的大会。我们40多人登上了观礼台，西一台是最好的台之一，我们已感到非常幸福了。不想，忽然叫我们登上主席台，我们真是欢喜若狂。听说主席还要接见我们，我们高兴地跳起来。我们上了天安门城楼，总理亲自指挥我们，列队、唱歌等。

8点5分，是我们最最幸福的时刻。我和骆小海、韩军走过天安门，忽然看到大厅里面坐著毛主席！我们不顾一切地冲了过去，紧紧地握住主席的手，激动地喊著：“毛主席好！”“祝毛主席万寿无疆！”这时主席站了起来，我们说：“我们是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主席没听清，问道：“哪一个？”我们说：“清华附中红卫兵”。我们说：“祝毛主席万寿无疆。”主席风趣地说：“万寿也有疆嘛。”我们问：“您给我们写信了？”主席说：“还是草稿，还没给你们呢。”我们说：“我们永远做您最最忠实的红卫兵。”主席说：“好，好。”我们说：“我们要永远造反，造反到底。”主席说：“我坚决支持你们。”我们简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离毛主席这么近，我们不断地紧握著主席的手，最少也有5、6遍。我激动地什么都忘了说，忘了听，忘了看，只觉得激动、幸福。最后服务员把我们拉走了，我们出来后，高兴得又蹦又跳，“我们见到毛主席了！”“我们和毛主席握手了！”“我们和毛主席谈话了！”“我们是最最幸福的人啊！”（2分钟多）。

9点40分，毛主席、林总、朱总等都穿着军服，戴著“红卫兵”的红袖章来接见我们。刘主席、周总理、邓小平、陈云、陈毅、贺龙等都戴上了红袖章，都是红卫兵了！我们高兴极了！当主席出现在我们面前，大家高兴地都跳起来，齐声高呼：“毛主席万岁！”这会儿我可要

好好地看看主席。我爬上栏杆，主席转了一圈后就站在台阶上，离我只一米远近。主席在台阶上向下面的红卫兵招手，站了4、5分钟，我们好好地看了4、5分钟，看得清楚极了。主席健康极了，这是我们最大最大的幸福啊！！

主席走了，我们还不满足，一起高呼“我们想见毛主席！”一面向中间挤，这时总理来维持，总理太累了。我在最前面，我一面帮助向后退，一面伸出手与总理握手。总理把手缩开，说：“我和你一个人握，大家不都要握了吗？”总理让我们坐好，领我们唱“大海航行靠舵手”，“我们走在大路上”。叫我们不要乱挤，要听话，说等会主席来和你们照相。我们高兴地合不拢嘴，我们真是太幸福了。

主席又来了，与大家分别合影留念。十分遗憾的是我没照上，把我挤到一边去了。这真是大喜中的不幸。

还有一件遗憾的事就是没让主席签名，当时我们什么都忘了，后悔得很。

合影时间为11点25分。

今天的大会是最最有意义的大会。主席穿上了军服，林彪、陈云都出来了。林彪还讲了话。红卫兵把持了整个天安门城楼，整个天安门广场。小将是军服，老将也是军服，全场一派威武雄壮，充分表现出中国人民不可敌的最高姿态。

我们普通的学生，并没有为党和人民做出什么贡献来，而主席亲自接见了我们。这是对我们最最大的支持、鼓舞和信任。我心里就有一个念头，好好地干，一定要把文化革命进行到底，一定要锻炼自己成为革命事业可靠合格的接班人。

注：红卫兵今天成了天安门广场及天安门城楼上的宠儿，亦随著新华社电讯出现在全国的媒体上：“几万个系著红袖章的‘红卫兵’们，象生龙活虎一样，在今天的大会上很引人注目。‘红卫兵’是首都大中学生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创建的革命群众组织，他们表示要一辈子当保卫毛主席、保卫中国共产党、保卫祖国红色士兵。在天安门城楼上，在天安门城楼两侧东西的观礼台上，站满了‘红卫兵’的代表。在天安门城楼上，在天安门广场上，在广场两侧的东西长安街上，今天都由雄纠纠的‘红卫兵’维持会场秩序”。

“在大会进行中，师大女附中一个‘红卫兵’，登上天安门城楼给毛主席戴上了‘红卫兵’的袖章。毛主席和她亲切握手。城楼上下的“红卫兵”，无限欢欣，有的一蹦尺把高，非常激动地说：‘毛主席是统帅，我们是他的小兵’。有人说：‘毛主席参加了我们的‘红卫兵’。对我们是最大的支持和鼓舞。毛主席给我们撑腰，我们什么都不怕”。

此前召开的八届十一中全会补选了包括陶铸、陈伯达、康生在内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六人，选举了政治局常委十一人，常委名单排列为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陶铸、陈伯达、邓小平、康生、刘少奇、朱德、李富春、陈云。从宋自己所列的名单看来，处于极度兴奋中的宋并没有察觉到中央核心领导层的重大变动。

贺龙，时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

1966年8月19日 星期四 晴

定出下阶段狠抓学习“十六条”，但抓不下去，声势搞不起来，为什么？

1966年8月20日 星期六 晴

一个下午跑到“新华社”，“人民日报社”，“解放军报社”，“新影”等。找到了一张有我和毛主席的相片。而我们三人见毛主席的却没有了。我正感到失望，看电影时忽然看到毛主席接见我们的镜头，我真高兴地跳起来。

1966年8月21日 星期日 晴

要好好学毛选，好好发动群众，这两条是最重要的。

我要象林彪同志那样“拼命”学毛著、用毛著。一定把毛泽东思想学到手。

1966年8月22日 星期一 阴

都要往外跑，千万不能急躁，要有信心。一定要把学校搞好，要敢干，把一切纳入正轨。

1966年8月23日 星期二

要注意学毛选，到北进家去了一趟。

注：北进，即孙北进，孙正之子，时在大连上大学。

1966年8月24日 星期三

与十二所学校加上大学各系的红卫兵，大闹清华园。拉倒二校门，撕掉了那些攻击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大学报。清华大学真是混蛋多，太王八蛋了。

注：8月18日后，清华大学内出现矛头指向刘少奇、王光美以及其他中央领导人的大字报。24日下午，清华大学红卫兵总部和文革临时筹委会联络了十二所学校的红卫兵两千余人进入清华大学，包围大字报区，封锁交通，拍摄并抄录大字报标题及作者姓名，撕毁了几乎所有大字报。拆除了清华的标志性建筑二校门，强迫清华中上层干部拆卸、搬运二校门的砖石，并对“黑帮分子”进行了抄家。半夜，红卫兵将学校大批中上层干部从家中拉到阶梯教室进行毒打后，关押长达两周之久。

1966年8月25日 星期四

广州“八一中学”和“华师附中”的来了7个同学，与他们聊了很久，了解到一些情况。邢立安他们怎么搞的，竟然站在那些乱七八糟人的一边，作狗崽子们的挡箭牌，真糟糕。

1966年8月26日 星期五 阴

半夜一连传来了3、4起杀害红卫兵战士的事件，大家真是义愤填膺。这是阶级斗争，阶级矛盾激化的表现。文化革命要武斗，要流血牺牲。这使我更充分认识到阶级斗争是复杂的，我要做好牺牲一切的准备。

怒火冲天，抄家抄出英国指挥刀，日本大马刀，北洋军阀将军服、匕首等等，真是阶级报复，阶级仇恨，我们再不能容忍了。回去后几乎各班狗崽子都被打翻在地，用皮带，竹条猛抽。这是阶级斗争，你打他，他杀你，这是你死我活。不过我还从来没打过人，还有些“温良恭俭让”，没有最深的阶级感情和阶级仇恨。这很危险，对敌人恨的不深，就是对人民爱的不深。你现在可怜他，他杀你时可不可怜你。要敢于斗争，勇于树敌。

1966年8月27日 星期六 阴

谢热江来了，我正好准备回家学习两天，就和他一起回家了。

毛泽东同志看了“逼上梁山”以后写给延安平剧院的信。

看了你们的戏，你们做了很好的工作，我向你们致谢，并请代向演员同志们致谢！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在旧戏舞台上（在一切离开人民的旧文学旧艺术上）人民却成了渣滓，由老爷太太少爷小姐们统治着舞台，这种历史的颠倒，现在由你们再颠倒过来，恢复了历史的面目，从此旧剧开了新生面，所以值得庆贺。你们这个开端，将是旧剧革命的划时期的开端，我想到这一点就十分高兴，希望你们多编多演，蔚成风气，推向全国去！

敬礼

毛泽东

1944年1月9日夜

注：谢热江，宋在广州八一中学及华师附中时的同学。

毛的这封信，4月曾作为中央批发《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的中央文件附件发至党内。原信1950年曾公开发表过，4月党内转发时，删去了原信抬头杨绍萱、齐燕铭的名字和“郭沫若在历史话剧方面做了很好的工作，你们则在旧剧方面做了此种工作”一句话。

1966年8月28日 星期日 多云

这两天在家里学习“毛主席给林彪同志的信”，“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十六条”，“青年运动的方向”，“五四运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有关章节等等。写了一份材料“运动如何深入”。一定要放眼世界革命，要有无产阶级的雄心壮志，要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品质，要不为名不为利，不怕苦不怕死，一定要把我国办成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把中国办成世界革命的“抗大”。不达目的，死不瞑目。

我的个人主义还很严重，离“四不”相差何止十万八千里。我要加倍努力，做一个白求恩式的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共产主义战士。

注：毛主席给林彪同志的信，即5月7日毛泽东看了军委总后勤部《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的报告》后，给林彪的一封信，后习称“五七指示”。该信于5月15日以中央文件转发党内，8月1日，《人民日报》社论“全国都应该成为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公开了该信的主要内容，同时该信亦广泛印发到全国。

“五七指示”集中体现了毛泽东左倾空想的“理想社会”思维模式，内中提及：“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1966年8月29日 星期一 晴

上午在革委会讨论了一下“运动如何深入”，大有人反对，说什么“不切实际”，“虚无飘渺”等等，总之一句话，“空想”。我很不满意，什么叫“空想”，理想就是“空想”吗？谈论国家世界大事就是“虚无渺茫”吗？不，我们要走前人没有走过的道路，我们要敢于标新立异，敢于“不切实际”。因为我们是新的创举，当然不切旧的实际。

1966年8月30日 星期二 雨

昨晚又见到段永宽，老气了许多，工农化了许多，但框框也多了许多，将来我也要工农化，但不能连缺点也学了去。

注：段永宽，宋在武汉东湖八一小学时的同学。

1966年8月31日 星期三 雨

昨晚与阎等失散，没上成车。中午他们从绵阳来电话，下午2点我马上上车。以后确要“刁”一些，在小事上，日常生活上也要敢“闯”。

注：自今天至9月27日，是宋的第一次外出串连。阎等，即同行的阎阳生、白若丽及狄小静（人大附中初中女生）。

本期编辑：

丁凯文（美国）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思语（美国）

《CND》总编：

陈天寒（美国）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021-8602

投稿专用地址：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获取

中文文件: hxwz-info@cnd.org 英文文件: 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 (WWW) 地址: <http://www.cnd.org/>
